



主 编 王建朗
副主编 马振犊 张俊义

中华民国时期 外交文献汇编 1911—1949

第四卷

下

中华书局



分卷主编 张俊义

中华民国时期 外交文献汇编

1911—1949

第四卷

下

中华书局

三、联俄、反帝外交的政策确定

说明: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南方政府在获取西方列强支持上一再碰壁后,最终选择了联俄反帝的政策。历史的选择是双向的,孙中山选择了联俄,而苏俄也选择了孙中山。双方各有其现实的考虑,孙中山和南方政府选择联俄,除了获得苏俄一方的军事、经济援助,也希望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学习其对党和军队的组织等,但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持慎重态度。而苏俄方面,十月革命后为减轻欧洲协约国对其新兴政权的干涉和国家现实利益的考虑,在华采取了双重外交,一方面承认北京政府,并同北京政府谈判,谋求外交上的承认;另一方面,则又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地方实力派联络,企图利用中国的内部矛盾渔利。经过接触、谈判,苏俄最后选择了支持孙中山领导下的南方政权。南方政府联俄政策的确定和苏俄政府的鼎力支持,彻底改变了南方政府的面貌,直接促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南方政府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由寻求同情与支持,转而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收回国家利权的反帝政策上来。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展开,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拉开了它宏大的序幕。

本章主要资料来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国民党中执会档案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9、11卷，中华书局，1985年—1986年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

（一）联俄外交政策的确定

说明：孙中山在寻求西方列强对南方政权支持的同时，对俄国发生的革命一直很关注。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前后，孙中山对俄国的革命大加赞扬，并一直谋求与苏俄领导人建立联系，双方互有通信往来。

除了书信往来，苏俄与其领导下的共产国际还陆续派出波达波夫、索科洛夫、马林、越飞等多人，与孙中山及南方政府接触，了解其观点与主张。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加快了联俄的步伐；而此时的苏俄及共产国际经过与孙的接触与交流，最终决定支持孙中山和他的南方政权。1923年1月，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与孙中山举行会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标志着南方政府联俄外交政策的初步确定。

1923年8月，苏俄政府正式决定派鲍罗廷以孙中山政治顾问的身份来华，帮助南方政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与此同时，南方政府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访问团，对苏俄革命进行考察。鲍罗廷来华后受到孙中山和南方政府的重用。在鲍罗廷的协调下，国民党成功地进行了改组，并确定了联俄容共的方针。在联俄的背景下，苏俄政府为南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人员和武器装备的援助，成立了黄埔军校，建立了新式的党军。南方政府得到了飞跃式发展，以北伐战争的

胜利为标志,可以说南方政府的联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 孙中山与苏俄的早期接触

契切林致孙中山函

1918年8月1日

亲爱的孙中山博士:

人民委员会交给我们一项光荣任务,向您,尊敬的导师表示感谢,感谢您几个月前曾以中国南方议会的名义给工农政府寄来贺信,并向您,中国革命的领袖,从1911年起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带领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奴役者——中国北方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政府——的伟人表示敬意。

您,尊敬的导师,前些时候在致工农政府的贺信中曾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中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

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是两国劳动阶级团结起来,建立普遍和平,它是人民从资产阶级手中取得政权以来,工农政府全部活动的依据。和平法令已表达了我们这一纲领。尊敬的导师,和平法令谅您业已知悉。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对东方各民族的宣言重申了这个纲领。

我们和您一样,在前进中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帝国主义政府的军队、资产阶级的雇佣兵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和俄国资产阶级,像铁桶一样包围着我们,他们企图在俄国恢复君主政体,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中国南方无产阶级的联系被切断了。两个月来,同您的联系也中断了,我们共同的敌人通过银行家和资本家所收买的报刊,正在散布着种种谣言,其目的是不让中国人民了解真相:工农政府生机勃勃,正进行着强有力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它一如既往,高举无产阶级战胜世界资产阶级和欧洲强盗及掠夺者的旗帜。

我们的处境困苦,面临着力量悬殊的斗争。在这个经受考验的时刻,当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爪要破坏俄国革命和剥夺俄国工农通过这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成果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企图与这些掠夺者勾结起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

因为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

让我们在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伟大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中国劳动农民万岁,中国工人万岁,俄中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向中国劳动阶级及其尊敬的导师孙中山博士致以最诚挚的祝愿,祝愿幸福,昌盛。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

格奥尔基·契切林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1—672页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1920年10月31日

亲爱的孙中山:

苏俄满怀喜悦的心情得悉,中国粉碎了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极端反动的势力,中国人民在国内外都朝着自决和自治方面迈进了一大步。您得知我国在击败弗兰格尔以及我国几乎在同所有邻邦的和平谈判中所取得的成功,当然也同样会感到高兴的。与波兰订立的条约,是以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丧失一部分领土为代价的,但是□□^①劳动群众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在波兰内部发展的进程中将发生□□^②

① 原件字迹不清——原编者注。

② 原件字迹不清——原编者注。

转折,他们必将消灭波兰现统治集团所制造的不公正现象,法国和皮尔苏茨基的统治已把波兰引入绝境,他们必将从绝境中找到出路。每一天都给全世界的工人带来了新生力量,而帝国主义制度则正在土崩瓦解,内部危机已提上各国日程。广大劳动群众只有靠自己,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打败现有的无数敌人。贵国正坚定不移地前进,贵国人民自觉地走上同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沉重压迫进行斗争的道路。谨祝你们取得伟大成功,中国兄弟们,行动起来吧!压迫你们的势力在一天天衰落下去。请再稍等一等,你们胜利在望。但是也不要浪费时间。应当立即恢复我们两国的贸易关系。不应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愿中国坚定地走上与我国友好的道路。

谨向您个人以及反帝斗争的战士——中国人民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完全忠诚于您的 格·契切林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2页

孙中山致齐契林的信

1921年8月28日

亲爱的齐契林:

我收到了您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这封信是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到达的。我之所以迟迟未作复,是因为想见为您送信的使者,他本来应当是将信从哈尔滨寄给我的。因为他至今还未能来广州看我,我就决定先回答您兄弟般的敬礼和关于恢复中俄商业关系的建议。

首先,我应当告诉您:这是我从您或苏俄某一位那里所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最近两年来,在资本主义的报纸上曾经有几次报道,断言好像莫斯科向我作过一些正式的建议。其实任何这样的建议都没有用信件或其它方式通知过我。万一从您的同僚中有谁已往曾寄信给我或现在正寄信给我,那么让我告诉您,我还没有收到过一

封信。

我应当简要地向您说明中国是怎样一个情况。且回溯到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当时我的政治事业,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开始并迅速普及全国的革命中获得了自己决定性的表现。革命底结果,是推翻了满清并建立了中华民国。我当时被选为总统。在我就职后不久,我便辞职让位于袁世凯,因为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比我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底巩固来说服我。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袁世凯很快就开始了恢复帝制的勾当。如您所知,我们已经将他击败了。

他死了以后,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的土匪头子,叫作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因此,可以正确地断言:在与日本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政策问题上,北京实际上是东京底工具。莫斯科在自己与北京的一切正式关系上应当好好地估计到这个情况。只有在首都实行彻底清洗之后——当我到那里时,这种清洗将会发生——,苏俄才可以期望与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

在您写信给我以后,我当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底总统。这个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因为:(一)它本身的权限是根据一九一二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立宪会议所通过的《临时约法》和一部唯一的《中华民国组织法》;(二)它的成立是为了执行在法定的中国国会中按照约法所赋予全权的政权机关底决议,现在国会会议正在广州举行。我的政府也是实际的政府,它的权限已经为中国西南诸省及其权力所及的其他各省所承认。

现在,因为地理条件,我还不可能和你们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只要看一看中国地图,您就可以看出:我的政府管辖下的领土是在扬子江

以南,而在这片领土与满洲和蒙古的“门户”之间——只有经过这些“门户”才可能建立商业关系——,有张作霖及其同盟者横梗着。只要还未建筑起包括在我所计划的中国铁道系统内的大铁道干线,那就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通过新疆的“门户”。

当我还没有肃清那些在首创的革命后第二天便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莫斯科就应当等待一下。您最近三四年来亲身经验,会使您能够了解我所面临的是何等艰难的事业。我最近九、十年以来都在从事于这一艰难的事业。如果不发生某种形式下的积极的外国干涉,我希望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一事业。外国干涉是很少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西方列强。它们大概已被北京喂饱了。

在这个期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像莫斯科一样,我希望在青年一代——明天的劳动者们底头脑中深深地打下中华民国的基础。

向您和我的朋友列宁以及所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友人们致敬。

您的真挚的孙逸仙

又:这封信是经伦敦苏俄商务代表团转寄的。如果它能安全无阻地到达您手中,就请通知我,以便我今后能经过同一个中间人与您联系。如果从莫斯科来的信将由你们在伦敦的使节转寄的话,我就这样地建立联系来接收它们。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1—593页

契切林给列宁的信

莫斯科,1921年11月6日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送上孙逸仙的信,其中有对您的问候^①。他称您是他的朋友,您本人同他认识吗?您从扬松的密电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北京设立代表机构后就可以同广州政府进行往来。

在此以前,我们认为不便给孙逸仙写信。去年我们给他写信时^②情况不同,因为当时同北京的谈判尚未开始。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66页

列宁给契切林的便函

莫斯科,1921年11月7日

契切林同志:

我不认识他,我们互相也从未通过信。

我认为,应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尽量秘密进行,要派我们的人去广州。

列宁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67页

孙中山与马林的谈话^③

1921年12月

我曾经三次与孙中山长谈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虽然华盛顿会议已使中国处于空前不幸之地位,但到他胜利结束北伐之前,要与苏俄结成联盟在事实上不可能。他声称,

① 指孙逸仙1921年8月28日写给契切林的信——原编者注。

② 指契切林1920年10月31日写给孙逸仙的信——原编者注。

③ 1921年6月,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正式代表来到中国,12月23日与张太雷抵达桂林,共停留三周,与孙中山举行三次谈话,此为1922年7月11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报告中的片段——原编者注。

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即提议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他的看法是中俄携手将完成亚洲的解放。但如果建立一个不适时的中俄联盟只会立即招致列强的干涉。他认为如果不使自己与苏俄连在一起,就有可能不受列强干涉地独立处置中国的事情。我指出,他的民族主义的宣传也必然招致列强的干涉,可是 he 不能忽视这种宣传,因为要不然他的整个地位就只能依靠少数将领的支持,这种人最好的情况也只能引导他到另一次南京妥协。已经参加他的部队的将领又离开他,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好几次,陈炯明的例子,就是孙中山的种种解释说不通的证明。但是,正月间,他只表示愿与苏联建立非官方的联系,不再前进一步。他同意派一个他的最好的同志到苏俄去。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8页

契切林致列宁的信

1922年1月26日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现将刊载卡纳决议的一期《小巴黎人》杂志和波诺米的复制件呈交给您。波诺米出版了《所有制》一书。

有一封孙中山写给我的信,信中引了您的话。我明天找出来(搬家之后还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开)寄给您。孙中山的政党——国民党的代表正在这里,我们应建立实际关系。他们没再提什么要求。我还在等待国民党代表答应送来的节略。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格·契切林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4—675页

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1922年2月7日

敬爱的孙中山先生：

我们很高兴收到您的信，很高兴能在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上通过国民党代表与该党直接接触。我与这位代表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我期望收到他关于中国形势的节略，并期望今后经常同他会晤。我希望不久我们的一位朋友将从这里前去拜访您本人，如不出现什么障碍，也许他经常留在您身边。同国民党代表会晤时，我与他讨论了与我们未来的关系有关的一切问题。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我要强调指出，我国政府和人民是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朋友，并热切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由人民政府领导的、彻底摆脱外来政治或经济压迫的统一、进步的国家；我还要强调指出，我们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政，也不想侵犯中国人民最充分、最完全的自决权，中国人民应当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当然，我们对中国人民进步的解放力量是完全同情的。不过，不管北京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终归是中国的正式政府，所以，我们仍力图同它建立正常关系。在我们同国民党代表未来的会谈过程中，同将拜访您的我们那位朋友的谈话中，以及同你们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我们将更明确地规定联系的范围。这些来往定将把我们同你们，同你们的朋友们联合起来。不管我国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政治立场今后如何发展，我国政府绝不会放弃同中国人民的最忠实、最热忱、最诚挚的友谊与合作。中国人民获得幸福与自由发展，也是我们最真诚的愿望。列宁同志也极感兴趣地读了您的信。他满腔热情地注视着您的活动。

亲爱的朋友孙中山，请接受我真诚、亲切的祝愿。

格·契切林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5—676页

孙中山致契切林函

1922年6月23日

敬爱的契切林：

达林业将尊函转交与文，今写几句作答。

文经历着陈炯明——一个多亏有文方有其一切之人，造成之严峻危机。文在一定场合意欲何为，将由达林转告。

谨向您和列宁致敬。

孙逸仙

1922年6月23日于黄浦“永丰”舰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6页

孙中山致列宁信

1922年12月6日^①

亲爱的列宁：

趁此机会谨就一件要事致短函与您……您能够迫使张作霖尽可能妥善地为苏俄的安全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遵照这个政策，您不仅能避开在中国反对您的危险的反动势力，而且将帮助我创造一种便于并加速俄中共同工作的局面。

您前次关于中国的声明使我国人民感到大有希望，并使我国人民把俄国看作中国的朋友，这个朋友保证中国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获得民族解放……

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派一个全权代表赴莫斯科，与您和其他同志一道会议符合俄中合法利益的共同行动。

同时，我应重申，与现在的中国政府的谈判，不仅仅是浪费时间，而且可能还是危险的。北京政府现在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仆和工具，所

^① 此件未标日期，今据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这是他十二月六日写给列宁的信”，断为6日——原编者注。

以与北京打交道意味着实际上在与列强打交道。这是危险的,因为经常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北京和这些大国将要弄种种手腕使您在中国人民面前陷入不利的处境。

再致崇高敬意。

谨致兄弟般的问候。

孙中山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6—677页

2. 苏俄选择孙中山

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

莫斯科,1920年12月12日

关于中华民国原第一任总统孙逸仙博士

我在上海时同孙逸仙博士联系密切,他是一位狂热的反英者,与北京政府和(目前垮台的)广州政府势不两立。

在中国各地他都有追随者,在革命人士中他有一些忠实的朋友。

在人民运动的现时领导人当中,他同陈炯明(福建省督军、反北京政府的粤军总司令)、唐绍仪(原第一共和国总理,现为和谈代表团团长)、唐继尧(云南省督军,现南方政府已由广州迁到云南)、李烈钧(南方政府总参谋长)、伍廷芳(南方政府外交部长)、陈独秀(有声望的作家和教授,新大学创始者)、孙洪伊(原第一革命政府内政部长,是在穷苦人当中享有很高声望的活动家)、章炳麟(杰出的现代作家)、林长民(北京政府司法部长)、梁启超(原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代表),以及他的一些私人朋友保持着联系。他本人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在报刊上常常被称为国民党首领,但这个党至今未成立。

孙逸仙身边的一些人同各个党派和团体(包括大同党)保持着联系。他的秘书和司库都是大同党党员。

孙逸仙博士有资金,许多资本家常常向他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孙逸仙在海南、四川、福建等省有很大影响,在他的影响下,在这些省份和中国其他地区,他可以发动起义并能够得到督军朋友们的支持,督军们兵合一处,为他提供一支颇为可观的武装力量。他把广州作为第一个行动目标,也就是要占领华南,他建议通过组织这次行动与北方(即北京政府)相抗衡。

中国恢复统一后,孙逸仙博士打算通过普选组织议会。

他告诉我,5月底他收到了您的信,鉴于我即将返俄,他请求我转达他对列宁的问候。协约国代表对我的搜查,使他有些担心,所以他未发表对苏维埃政府的书面呼吁书。因为他同莫斯科的交往一旦暴露,就会给他在外国租界的逗留和在中国进行的工作造成麻烦。我们同他约定使用我的中英文密码进行联系。除了他的照片,我没有他的任何文件。在各种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表露出,他不相信我们能成功地在俄国实现共产主义。他以中国人民的经验作为自己的论据。不过我得以说服孙逸仙向我们这里派驻两名代理人。他选择了廖仲恺(广州政府财政部长)和在华南享有声望的朱执信将军。这两个人同我进行了长谈,应在8月取道欧洲前往。

孙逸仙是得到译载我国宪法、土地法令、俄法条约等文件的英文小册子的第一人。

我将小册子交给了李××^①,他把它译成中文并将它与我弄到手的托洛茨基的文章一起刊登在他的共产主义出版物上。

波达波夫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7—49页

^① 原文名字不清,据查可能是李震瀛——原译者注。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①

1921年4月21日

绝密。

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
参与组织广州政府的力量

1. 国民党

国民党,大约成立于15年前,有纲领,与我们的社会革命党有些相似。该党的策略经常改变,受政局左右。它有时革命情绪高涨,有时黯然失色,成为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党。1911年,国民党担起了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推翻了满清王朝。随即同袁世凯、段祺瑞之类的封建军阀建立了反常的联盟,结果被军阀赶下政治舞台,不光彩地转入地下,偶尔在工作中还采取了恐怖主义。

在这十年间,国民党曾再次试图在南方登上政治舞台,但因重与反动派联合,又不光彩地为自己准备了绝路,而反动派利用国民党作幌子来实现自己的阴谋,再次取得了胜利。

1915年,国民党又转入地下,做工农群众的组织工作,这时它无疑已开始向左转。

孙逸仙博士是该党首领,1919年的一期《密勒氏评论报》上写道:他的党的基本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如所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作者附带说明:中国情况特殊,中国需要摆脱封建制度,需要完成工业资本主义革命,然后才开始进行社会革命。然而这些革命相近似,犹如一个链条上的环节,作者并未提供如何分清它们的方法。这就是中国社会党——国民党的策略原则的主要模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由谢米切夫编辑出版的上海《太阳》杂志的第1期上有这篇文章的译文,我动身去中国前,在东方部看到了这

^①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1919至1921年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自1921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原译者注。

期杂志。)

2. 中国共产党

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这个团体参加了同国民党中央关于一旦陈炯明军队打败南方政府后如何组阁的谈判。这次谈判的结果是,陈独秀被列为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未来广州政府成员,将做同国民党的联合工作。

广州政府的诞生及其采取的措施

1920年10月29日,陈炯明军队占领广州。11月14日,以孙逸仙博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由上海南迁广州。新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查封所有赌窝,颁布义务教育法令,最后还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的适用于苏维埃情况的法令。1920年12月19日,陈独秀教授启程去广州,出任国民教育部长职务。1920年12月28日,公布了以下政府组成人员:

1. 内务部长孙逸仙
2. 交通部长唐继尧(国民党)
3. 司法部长徐谦(国民党)
4. 外交部长伍廷芳(国民党)
5. 国民教育部长陈独秀(共产党)
6. 陆军部长陈炯明(国民党)
7. 参谋部长李烈钧将军(无党派^①)

政府在最初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向北京政府提出以下要求:

1. 从政府中清除所有封建军阀;
2. 撤销联合令;
3. 不签订对外借款

^① 原文如此,应为国民党——原译者注。